

城乡劳动力迁移规律研究

王国霞, 程丽琳

(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太原 030006)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劳动力迁移在迁移数量、迁移人口学特征、迁移方式、迁移空间模式上都表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比较成功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尝试对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规律进行总结。本文认为, 迁移动机和空间迁移模式遵循经济主导法则; 迁移者个体特征及其迁移行为遵循人力资本差异化法则; 城乡迁移方式与就业选择则遵循社会关系主导法则。由于制度方面的原因, 我国城乡劳动力迁移依然表现出不彻底性。

关键词: 城乡迁移; 迁移规律; 城市化; 人口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1)03-0265-08

当前, 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2000—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加1.13%, 年均增加城市人口1700万人,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研究表明, 人口迁移已成为很多城市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1]。根据我国“十二五”规划草案, 到2015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51.5%, 城市人口将增加4.2亿, 很大一部分也将来自于农村人口的迁移。这些农村人口具有何样特征以及他们未来在全国各类城市中如何分布, 无疑将对我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关于人口迁移规律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已有不少理论^[2-3]。宏观研究方面有雷文斯坦(E. Ravenstien)的“迁移七大规律”、刘易斯(A. W. 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M. P. Todaro)的预期收入差距模型、博格(D. J. Bogue)的“推—拉”理论等。微观研究方面有R. R. 塞尔(R. R. Sell)和G. 德琼(G. DE. Jong)的迁移动机理论、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人力资本

理论、斯托佛(S. A. Stouffer)的介入机会学说、罗西(P. H. Rossi)的生命周期模型、斯塔克(O. Stark)等人的迁移新经济学等。中国的人口迁移, 除遵循上述规律外, 还有其本身的特点。因此,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 随着我国人口迁移数据资料可获取性增加, 国内外学者针对规模宏大的人口迁移作了相当多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比较成功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尝试对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规律进行总结, 为推进理论研究尽微薄之力。

1 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宏观经济背景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快速发展期, 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因素, 而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需要通过人口迁移过程来实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表明, 人口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工业化过程的显著特征, 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世界各发达

收稿日期: 2011-06-07; 修回日期: 2011-07-14

基金项目: 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40901089)

作者简介: 王国霞(1976-), 女,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人口迁移、区域发展的研究。E-mail: wanggx@sxu.edu.cn

程丽琳(1988-),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现代化进程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的城市化率从1870年的25.7%迅速增长到1920年的51.3%,到1960年时,城市化率已达到70%,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4]。虽然在资源、技术、资金、人口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推进及其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并不顺利,如拉美一些国家超速度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给城市就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因城市基础设施、生活服务条件等不能及时地满足和适应大量聚集人口的需要,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诸如城市人口膨胀、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环境恶化等等,有相当多的居民住在贫民窟中。但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 A.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所论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5]。因此,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把农业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其他产业,转移到城市中去。

我国自1978年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显性化,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农业部门以外的生产部门寻求就业空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开自己的家乡,向城镇迁移,出现“民工潮”。近些年,在农业部门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断产生,他们已成为我国目前城乡人口迁移的巨大原动力。日益扩大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推动我国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同时,自1978年后我国在户籍制度方面大致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逐渐放宽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门槛,使人口迁移较以前更为自由。加之,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和城市经济的多

元化加快了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6][10]}。这些都强有力地推动我国城乡人口大规模的迁移,进而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2 迁移动机和空间迁移模式:经济主导法则

2.1 经济因素是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主要驱动因素

正如雷文斯坦(E. Ravenstien)所言,推动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任何因素都无法与人们渴望改变自己物质生活状况的强烈欲望所激发出的动力相比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特别是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几乎均以寻找就业机会、获取更高经济收入为目的。有关人口迁移(或人口流动)的社会调查发现,在回答“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获取更高的收入”是普遍认同的答案。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差距客观存在并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图1)。这种趋势强力推动了人口迁移,研究表明,城市的拉力已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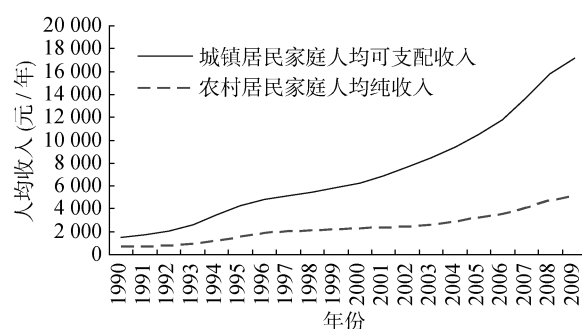


图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变化

经济因素在跨区域人口迁移中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正相关,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形成了我国跨区域人口迁移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并且没有特别明显的扩大趋势;而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原本较大的城乡差距,又在迅速扩大之中(表1)。因此东部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目标地,长期以来人口迁移净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人口的净流出,省际迁移比较明

表1 部分年份东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东部、中部、西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

年份 区域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3	2009
东部	1.92	1.57	1.79	2.12	1.99	2.49	2.92
中部	2.53	2.16	2.70	3.65	3.25	4.33	4.37
西部	2.58	2.43	2.90	4.29	3.94	5.49	5.49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 1949-1999》，2004、2010 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8-10]。

显地呈现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流迁规律。

微观层面,经典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由独立的个体为达到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新迁移经济学认为,人口迁移的决定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人做出的,而是由相关的更大单位,特别是家族或家庭来共同做出的,迁移不仅可以使个人的预期收入最大化,而且也可以使家庭风险最小化。当家庭户规模越大,户内人数的增多会刺激个体的迁移。此外,“相对经济地位假说”认为,农村人口迁移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即那些按照当地基本要求来看收入水平太低,因而感受到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会有迁移动机^{[11]89}。无论怎样,迁移行为都起因于经济因素——或是追寻个人收益最大化,或是追寻家庭风险最小化。

2.2 迁移地选择的空間邻近性

由经济因素主导的迁移动机导致城乡劳动力迁移从地区流向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符合雷文斯坦(E. Ravenstien)的人口迁移规律——就近原则。作为迁移行为的实施者,迁移者个体的决策行为是对迁移成本和迁移收益权衡的结果。在这里,迁移成本既包括与迁移活动直接有关的寻找工作的费用、交通、住房费用等支出的货币资本,也包括因放弃原来所从事工作而减少收入的机会成本和离开所熟悉工作与生活环境所引起的心理成本。迁移收益则是迁移者在迁移以后因为有更好的机会而增加的收入。在迁移成本中,距离对于迁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仅在于距离越远,其要支付的交通费用越高,还在于距离

的增加会使得迁移者能得到的信息减少,心理成本增加。两地区的空间距离越远,则两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于理性的农村劳动力而言,一般选择距离较近的地区作为转移目的地。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选择看,也是以省内转移为主,其比例要大于跨省转移(表2);即便是跨省转移,一般也倾向于转移到距离较近的省区。广东省作为迁入地,主要接受的是来自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份的流动人口。上海主要接纳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的移民,而北京和天津则主要接纳河北省的移民。

表2 1985—1990年、1995—2000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农村人口省内和省际迁移构成 单位: %

年份 区域	1985—1990		1995—2000	
	省际	省内	省际	省内
东部	27.83	72.17	22.42	77.58
中部	30.27	69.73	42.71	57.29
西部	37.77	62.23	41.05	58.95
全国	31.58	68.42	35.40	64.60

数据来源: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马忠东等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同样发现,跨省流动人口对目的地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迁出地与区域中心(广东、长三角、环渤海)的距离。在仅与一个区域中心毗邻的省份中,大部分流出人口选择此中心作为最佳目的地。在流动人口对目的地的选择上,安徽人对长三角,湖南人和广西人对广东的选择在本省流动人口中的比例分别高达74.1%,71.8%和87.4%。若迁出地与几个区域中心等距离或长距离时,流动人口对目的地的选择则相对分散,如河南与三区域中心等距,流出人口分散分布在三个区域中心^[12]。

2.3 省际人口迁移空间格局日益极化

对于省际迁移者,迁移成本中最主要是距离成本和心理成本,而这两个成本随着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各种信息交流的不断广泛和便捷,都在降低,因此经济发达地区较高的收入水平成为影响农村迁移者进行迁移选择的主导因素。改革

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一直都是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地,但东部沿海各省市经济发达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不同强度的吸引力,经济越发达,吸引人口的范围越大,吸引劳动力数量也越多。东部的广东、浙江、上海、江苏是我国四个最大的农村人口接收省,其次是北京、福建以及新疆,它们所吸纳的农村人口占到 1995 年—2000 年全国农村总迁出人口的 74%。广东省作为我国大量农村人口选择的主要目的地,吸纳的农村人口占到全国农村总迁出量的 38%。近期对省际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的发展经历了由“多极化”到“极化”的过程。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的数量在 1982 年—1987 年、1985 年—1990 年、1990 年—1995 年、1995 年—2000 年、2000 年—2005 年依次为 6 个、11 个、11 个、7 个、6 个^[13-14]。这种变化,显然是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3 城乡迁移者的特征: 人力资本差异法则

3.1 迁移者多为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

人口迁移的理论和我国人口迁移的实践揭示,迁移者的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表现出极强的选择性,即迁移人口的特征与常态下的整体人口特征表现出极大的差异^[15]。总体而言,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在人口学方面的特征要优于未外出的人口,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年龄上比未外出人口的整体水平年轻,教育程度上优于未外出者。从某种角度看,他们是农村中的精英。

尽管总体来说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相对于农村留守劳动力明显偏高,而对于城镇劳动力来说却是明显偏低的。因此,从他们就业的工种分布看,农村外出劳动力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种,大部分从事一般性劳务,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少,而管理类的工种则涉足很少。所涉技术工种,大多数为传统的手工操作

技术,如木工、瓦工、修理等,真正属于现代技术的并不多^[16]。

3.2 空间迁移距离随人力资本递增

迁移行为的发生存在一个最低的人力资本门槛。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家庭,往往也是收入很低的家庭,难以跨越迁移所要求的最低人力资本门槛,因此不选择迁移,而是依旧留在农村。受教育程度可以粗略地反映人力资本状况。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对改变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倾向于迁移。但是,教育对迁移决策的影响,特别是对空间迁移距离的影响,并非线性的关系,即教育程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会促进迁移决策的形成,但是在越过某一临界点之后,更高学历的劳动力可能更倾向于在本地寻找就业机会^{[11]17}。研究和调查表明,在外出农村劳动力中,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往不会发生远距离的迁移,而是选择在本地寻求就业机会^{[17]105}。因此,对微观个体的研究表明,迁移者的人力资本与迁移距离之间的关系似乎呈现出迁移的空间距离随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而减少,即外出劳动力空间迁移距离随人力资本递增的规律。笔者认同赵耀辉从迁移成本的角度对此规律所给出的解释^[18]。首先,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得到的尊敬远比外出就业要多。其次,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方面的原因,外出打工者将永远是外出打工者,这种临时性就业的成本是很高的,包括子女教育、住房等,由于无法携家属同往而无法享受亲人的安慰和尽到照顾家庭的义务,所以他们在城市里面临极高的心理调整成本。

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律仅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有效。从宏观数据考察,受教育程度与迁移距离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的距离越远。对湖北省外出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显示,省际迁移的

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省内迁移人群 2.7 年。这一有限的空间范围大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3 高人力资本的迁移者家庭化迁移趋势明显

目前,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形式已经由过去的个体迁移为主,逐渐演变成现今的举家迁移,表现出家庭式迁移和个体迁移并重^[19]。能够进行家庭式迁移的农村劳动者一般而言将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家庭式迁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中的某一成员,往往是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家庭成员,出于经济原因先行迁移,在迁入地工作或生活一段时间后,逐步将本家庭成员接到迁入地;另一种是夫妻同行或者父母与子女同行型的迁移。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先行迁移者,较长时间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为其积累了相当的人力资本存量,包括工作经历(经验),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这样才能满足家庭其他成员加入时的基本需求,包括住房或者工作需求等。常见的情况是夫妻在城市中从事小型的商业活动,摆个小摊或是小铺面,成为自我雇佣者。而能够成为自我雇佣者则需要一定的资金、进货和销售渠道等,这恰恰是高人力资本的反映。对于第二种迁移者,尚不能作出比较明确的分析。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家庭化迁移的趋势,但仍然有一部分迁移人口并未携带子女同时迁移,从而导致了家庭两地分居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来自于迁移过程的成本提高,但更为主要的是来自于迁入地的各种政策性限制,特别是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政策,以及医疗卫生保健政策等。无论如何,家庭式迁移,标志着进城农民的家庭重心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研究表明,如果进城农民的配偶也在城市的则移民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20],而这无疑对城市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4 新生代更期望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在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

法律意识、市场竞争意识等方面都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期望也更容易融入城市。根据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上为主,第一代农民工则是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新生代外出者大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老一代外出者则以家庭经济利益为主。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大多进城务工多年,身心疲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进城务工的艰辛,城镇对他们的拉力逐渐减弱,融入城市的期望并不高,大部分外出打工者有回流的意愿。而年轻人身强力壮,体力和精力都能承受城镇的劳作节奏,“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有更多的勇气面对城镇工作与生活的艰辛和困难,也习惯或喜欢城镇的方便和繁华,留在城镇的梦,特别是让子孙后代留在城镇的梦对他们形成了强大的拉力^[21]。也因此,对于城乡迁移者应实施不同人口迁移政策,有针对性的吸引新生代农民工以推进城市化。另一项研究表明,单纯外出务工的农民和愿意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在工作发展上会有不同的选择,预计回到家乡的进城农民不会将已有的钱花在教育或职业提升上,而愿意留在城市的则更关注自己今后的发展^①。显然,迁移意愿的提升对于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4 城乡迁移方式与就业选择:社会关系主导法则

4.1 链式迁移是最为普遍的迁移方式

链式迁移是我国目前城乡人口迁移最为普遍的迁移方式。尽管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扩大,信息传递成本逐渐降低,但是关系迁移个体切身利益的迁移决策,更多的来自于亲属和朋友的影响,而不是政府和市场。更何况目前对大多数迁移者来说,迁移信息的获取方式还不是很完备,获取途径基本是亲缘、乡缘、其他人际关系网,所以新移民倾向于迁入他

资料来源:王微的研究论文《进城农民的家庭模式及其迁移选择》。

们拥有社会关系的地区。因此, 社会关系网络成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空间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劳动力是否发生迁移, 有关迁移信息的有无是十分重要的。在迁移特别是跨地区迁移的劳动力人口中, 绝大多数是通过家人、亲戚朋友、同村人的介绍, 或从他们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才得以迁移的。迁往较近的高收入地区, 不仅可以节省伴随迁移发生的物质费用, 还可以减少因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费用。但是, 如果提供信息的人远在它地, 一般也只能迁往那里。因此, 在考察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因素时, 大多数研究者都将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纳入模型^{[17][104][22]}。也正是由于链式迁移, 我国人口迁移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 即特定迁入目的地的迁移人口主要来自附近特定的若干省份, 或特定迁出地的迁移人口主要流入到特定的地区。

4.2 就业信息的获取依靠社会网络

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指出, 城乡人口迁移取决于预期收入差距, 而预期收入差距取决于实际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对于迁移者而言, 在迁入地提高就业概率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已经外出的迁移者介绍。研究表明, 社会网络在潜在外出者获得特定就业信息方面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当然, 随着迁入者在迁入地停留时间的延长, 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更为广阔, 但最初就业信息的获取更多的来自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这种就业信息和迁移方式, 使得外出农村劳动力自组织性很强, 在这种组织网络中流动, 使得外出者在缺乏社会公开信息和组织的情况下, 大大降低了外出的风险和流动成本。

大量的社会调查显示, 建筑业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最多的行业, 居第二位的行业是商业、饮食业和其他服务业, 紧随其后的是工业。

5 城乡人口迁移趋势

依据上述人口迁移规律, 纵观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可以归纳出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迁移

的大致规律。

(1) 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还将继续。据预测, 未来 10 年内, 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 1 500 万人左右的水平上。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总量将达到 7 300 万人左右, 省际常住迁移人口的累计量将达到 2.2 亿人左右, 年均约为 1 100 万人^{[6][13]}。

(2) 经济动因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区还将继续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 未来农民工群体仍会以流向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 但随着我国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各项努力的实施, 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将可能减弱, 农村劳动力将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镇)扩散^[23]。

(3) 农民工仍会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为主, 但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将逐渐增多。为了鼓励农村人口彻底实现转移, 我国政府已逐步放宽了户口制度, 并把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权益(包括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放在了政治议程的显要地位, 这些做法对遏制继续扩大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这些制度安排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善, 所以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4) 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较强的认同感,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作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群存在, 如何使这一人群市民化将是学界和政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6 建议

针对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特征和未来趋势, 为促进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和人口合理布局, 可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城乡人口迁移:

(1)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会以经济型迁移为

主导，因此，广开就业门路是我国实现劳动力顺利转移、城市化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由于区域基础、国家政策、发展战略等因素，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也不同，相应地，不同区域如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式也应有所不同。东部地带要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区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推进小城镇的专业化。中部地带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鼓励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农副业，在农村内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西部地带要抓住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加快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2) 改善城乡人口迁移的政策环境。目前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不完全性主要归咎于各种制度约束，因而加快制度改革在当前尤为重要。为此，城市方面，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清理在就业、教育、医疗方面的歧视性政策，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探索适合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农村方面，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流转制度。

(3) 重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在城市受培训和受教育是解决迁移人口城市化和大幅度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农村方面应继续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在普及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积极推广适用技术教育，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 [1] 刘盛和, 蒋芳, 张擎.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协调发展对策[J]. 人口研究, 2007, 31(3): 7-19.
- [2] 吕世辰. 国外学术界关于农民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综述[J]. 中国农村观察, 1998(3): 32-33.
- [3] 李竞能编著. 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35-174.
- [4]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3: 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6-57.
- [5]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45-95.
- [6] 蔡建明, 王国霞, 杨振山.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J]. 人口研究, 2007, 31(5).
- [7] 李培林. 农民工: 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98-201.
- [8] 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五十年 1949-199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 [9] 国家统计局. 2004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 [10] 国家统计局. 2010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 [11] 蔡昉, 都阳, 王美艳. 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马忠东, 王建平. 区域竞争下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分布[J]. 人口研究, 2010, 34 (3): 3-16.
- [13] 李薇. 我国人口省际迁移空间模式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 32(4): 90-96.
- [14] 王桂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及其变化[J]. 人口与经济, 2000, 3: 8-16.
- [15] 钟水印. 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143.
- [16] 时金芝, 苏志霞.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本特征[J]. 人口研究, 2004, 28(2): 52-56.
- [17] 蔡昉.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8]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 经济研究, 1997(2): 37-42.
- [19] 周皓.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 2004, 28(6): 60-69.
- [20] 王毅杰. 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05(5): 26-32.
- [21] 刘传江.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 人口研究, 2010, 34(2): 35-38.
- [22] 殷晓清. 农民工就业模式对就业迁移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01, 5 (30): 20-25.
- [23] 韩长斌.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J]. 经济研究, 2006(12): 7-9.

Study on the Migration Law of Rural-Urban Labor Force in China

Wang Guoxia, Cheng Li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labor mi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en showing changing trends on migration number,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migration patterns and spatial patterns and presents certain laws.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cholars, this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the migration law of rural-urban labor force in China. Migration motive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follow the Law of Economic Factors Leading. Migran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gration behaviors follow the Law of Differentiation in Human Capital. Rural-urban migration ways and choices of employment abide by the Law of Social Relations' Dominant. However, the labors'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to urban areas is still incomplete in China for the unreasonab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Key words: Rural-urban migration; Migration Laws; Urbanization; Demography